

北京专史集成

主 编 王 岗

北京教育史

本书主编 刘仲华

 人 民 出 版 社

北 京 专 史 集 成

主 编 王 岗

北京教育史

本书主编 刘仲华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教育史 / 刘仲华 主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11 月

(《北京专史集成》/ 王岗 主编)

ISBN 978-7-01-007573-0

I. 北… II. 刘… III. 教育史-北京市

IV. G5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9555 号

北京教育史

BEIJING JIAOYU SHI

主 编: 刘仲华

出版策划: 张秀平

责任编辑: 关 宏

装帧设计: 曹 春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发 行

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装订: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8 年 11 月 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3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4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07573-0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序

北京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就一直从事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30年来，在全所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取得了一些北京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其中，又以曹子西先生主编的《北京通史》为代表，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较好的影响。而《北京通史》的问世，又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北京历史文化奠定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

2006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加大扶持力度，提出把《北京专史集成》列入院科研重大课题，使得我院的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从整体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历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已经开始对北京专史进行研究，如王玲女士撰写有《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尹钧科先生撰写有《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于德源先生撰写有《北京农业经济史》，吴建雍等人合写有《北京城市生活史》、《北京城市发展史》，等等，这些专史的问世把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逐步引向深入。但是，要想形成一套体系完备的专史研究系列，显然仅仅依靠个人的研究力量是不够的，必须组成一支力量相对强大的科研队伍，才能够完成系列专史研究的繁重工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领导组织历史研究所的全体科研人员对《北京专史集成》课题进行了认真的论证。特别是课题总顾问刘牧雨院长和课题总策划戚本超副院长对课题中研究项目的编写原则和立项次序都给予了精心指导。经过论证，初步确定了《北京专史集成》课题的第一批研究项目，即：

1. 北京政治史；
2. 北京经济史；
3. 北京农业史；
4. 北京手工业史；
5. 北京商业史；
6. 北京军事史；
7. 北京文化史；
8. 北京文学史；
9. 北京美术史；
10. 北京学术史；
11. 北京著述史；
12. 北京戏剧史；
13. 北京风俗史；
14. 北京考古史；
15. 北京民族史；
16. 北京宗教史；
17. 北京佛教史；
18. 北京道教史；
19. 北京伊斯兰教史；
20. 北京基督教史；
21. 北京教育史；
22. 北京城市发展史；
23. 北京建筑史
24. 北京园林史；
25. 北京陵寝史；
26. 北京地理学史；
27. 北京交通史；
28. 北京城市生活史；
29. 北京建置沿革史；
30. 北京对外交流史；
31. 北京水利史；
32. 北京饮食史；
33. 北京服饰史；
34. 北京环境变迁史；
35. 北京音乐史；
36. 北京名胜史。

这些研究项目，只是北京专史庞大体系中的一小部分，今后随着科研工作的不断深入，专史的项目也会不断增加。《北京专史集成》经过历史研究所论证之后，院领导又组织全院的专家学者对这个重大课题进一步加以论证，并且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对专史的撰写工作有很大帮助。

《北京专史集成》中的每部专史的容量，视其内容的多少，大致在30万字左右，有些内容较多的，字数可以多一些，反之，则会少一些。各部专史的时间跨度，一般始于远古，迄于新中国建立。有些部专史在撰写过程中，时间会有所下延。如《北京建置沿革史》，必须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才能够对今天北京政区的沿革状况有全面的叙述。各部专史的地域范围，也不是严格局限在今天的北京政区，而是根据不同朝代政区划分的变化而随之变化，如汉唐时期的幽州，辽代的南京析津府，金代的中都大兴府，元代的大都路，明清时期的北京顺天府，等等。政区范围的大小虽然会不断变化，但是其核心地区仍然是今天的北京。

《北京专史集成》的撰写，有很多难以处理的地方。例如，“专”和“史”的关系。“专”是指专门、专业，如在《北京宗教

史》中，“专”是指宗教或是宗教学，而“史”则是指在北京历史上曾经发生或是出现过的、与宗教有关系的事件或人物，当然也包括相关的典制。如在《北京宗教史》中，我们所研究的佛教史，主要的着眼点不仅仅是在北京地区的禅宗、律宗、净土宗等佛教流派的发展、变化，更重要的，是着眼于这些佛教流派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其代表人物的社会活动、历代统治者和社会各界对这些宗教派别的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重要宗教事件，等等。我们认为，要想处理好“专”与“史”的关系，一方面，要掌握相关专业的基础知识；另一方面，又要对当时的历史状况有准确的认识，掌握宗教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资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正确认识不同历史时期宗教产生、发展和兴衰的变化历程。其他专史的撰写工作也是如此。

再如，“全国”和“地方”的关系，换言之，即“全局”和“区域”的关系。在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之前，所有的北京史都是“地方史”，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也有着明显的“区域”性质。但是，当北京成为全国首都之后，在北京发生的许多史事除了具有“地方”和“区域”的性质之外，又具有了“全国”或是“全局”影响的特质。如“戊戌变法”、“五四运动”等，其影响范围之广，影响力之持久，显然不是局限在北京地区的。此外，由于北京的统治中心地位，有些发生在其他区域（甚至国外）的重大历史事件，也会对北京产生巨大的影响。如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这些重大事件的始发地虽都不在北京，但其对北京的巨大影响甚至超过了在北京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因此，如何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在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中确实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

《北京专史集成》课题立项后，得到了学术界和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首先，是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著名史学前辈在年事很高、工作繁忙的情况下，热情支持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慨然担任特聘学术顾问，并且对北京专史的撰写工作提出了珍贵的指导意见；有些史学前辈还在百忙之中审阅了部分书稿的内容。其次，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陈之昌主任和李建平副主任对本课题的重视，使《北京专史集成》得以被列为市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再次，本课题的出版工作得到了人民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在出版经费较少的情况下，得以立项出版。特别是资深历史学编审张秀平女士和诸多编辑人员，认真审阅全部书稿，并且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

意见，为各部专史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一批批老专家学者们为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他们的退休对北京文史研究带来了一些影响。但是，许多已经退休的老专家仍然坚持工作在科研第一线，笔耕不辍。《北京专史集成》中的一些项目就是以他们作为骨干带领年轻同志完成的。一批批青年学子陆续来到所里，他们在科研能力上尚需锻炼，在学术见识上亟待积累，但是，他们有朝气，有吃苦耐劳的干劲，有新的更加开阔的视野，假以时日，他们在《北京专史集成》研究中的成果将会越来越多。我相信，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热心帮助下，在历史研究所全体新、老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持之以恒，《北京专史集成》将会为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不断增添新的科研成果，为首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不断做出新贡献。

值此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建院 30 周年、《北京专史集成》开始出版之际，是为之序。

王岗

2008 年 10 月

前言

中华民族是一个很早就注重全民教育的民族，早在先秦时期就构建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教育体系，并且在以后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北京在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之前，教育事业的发展相对比较落后，而在成为都城之后，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很快就变成了全国著名的教育中心。因此，《北京教育史》在中国教育史上应该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方面也应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明都只有在传承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而传承的方式有很多种，最有效的一种就是教育。因此，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塑造一个最完美的人。这个人是时代的理想模式，有着崇高的信仰追求，有着深厚的道德修养，有着出色的生产技能，有着良好的生活方式，等等。如果从我们的教育机构中培养出来的人都是如此完美，那么，教育机构的职能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了。可惜的是，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国家的众多教育机构却很少能够培养出这样完美的人才。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较早使用“教育”这个词的是《孟子》，其文曰：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见《孟子·尽心上》）其一乐，天伦之乐也；二乐，为人之乐也；三乐，同道之乐也。显然，孟子把这“三乐”放在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位置，是有其深刻道理的。尤其是二乐与三乐，有着密切的关系。二乐讲的是君子做人的准则，虽然很简单，却韵味无穷。三乐就是要把君子做人的准则传承给更多的人，即天下英才。显然，孟子的教育观抓住了教育的

核心内涵。

在中国古代和近代，也就是从先秦时期一直到清代后期，传统的教育模式始终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不论是中央政府的国子学，还是地方政府的州县学，乃至乡里的庠序，其教育的主要内容皆是儒家的传统学说，只是随着儒家学说的发展变化而有所变更，从《五经》、《六经》到《十三经》，再到宋儒“理学”，等等。各级教育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培养治国的人才，或者说是培养合格的“做官”之人。其教育的基准点是做人，也就是“修身”。这一点做好了，自然就可以“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了。因此，中国古代教育机构用来培养学生的，往往都是“大道理”，或者说是一些“做人”的基本准则。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显得很“迂腐”。

与中国古代教育制度联系最为密切的，乃是人才的选拔与任用制度。这个制度的产生及确立，也经历了漫长的变迁过程。最初的选拔，更准确地说是推荐，主要是经过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社会推荐，另一部分是学校推荐，由推荐而发展到考核，是通过学校的教育机制来实现的。通过这两个部分的推荐与考核，政府得到了优秀的人才。科举考试成为一种制度，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在确定核心价值观念的前提下，尽可能公平的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而人们在学校学习的过程，就是对核心价值观念的培养过程。从学校的考核转变为全社会的考核，以及人们对考核方式公平性的认同，是科举制度得以确立的前提。

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后，对中国思想界的震动是巨大的，对中国教育界的震动也是巨大的。传统的做人准则和伦理价值观念受到极大冲击，过去完美的理想模式显得残破不堪了，“做人”已经不是大多数人认同的基本准则了，“做事”变得更加迫切。为了能够“做事”有成效，许多人竟然放弃了“做人”的传统原则。西方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使许多中国的精英人物丧失了“自信”，失去了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明传承的“自信”，从而在思想界造成了一段很长时期的混乱，盲目“崇洋”和盲目“自卑”的恶劣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代。

在教育界，西方文化传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许多重要的学校开始模仿西方教育的样式，自然科学逐渐取代社会科学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人们对数理化的关注超过了“子曰”、“史云”，一向被尊为“圣人”的孔子也被人们打翻在地并踏上了一只脚，“师道尊严”被扫地出门了，“打倒孔家店”成为激进的时髦口号。中国的教育界究竟要

培养什么样的人，已经没有了大多数人都认同的理想模式。率先走出国门去寻求“真理”的人们开始反思，也就是用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来重新反思中国曾经走过的历史道路。由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与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差异过大，反思的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许多接受西方文化观念的人们看到中国的事物总觉得不如西方，但是，要用西方的办法在中国做事却又总是行不通。

对于一个优秀民族几千年来传承文明的教育体系，到底应该如何评价？评价的依据又是什么？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当代人们深思的问题吗？我们的当代教育体系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正在培养什么样的人？这难道不是又一个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吗？显然，不论是中国古代的教育体系，还是西方当代的教育体系，都有其优长的地方，也都有其不足的弊病。但是，我们如果从几千年中国教育体系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不能不承认，就是这个在中国近现代转型时期被攻击得几乎一无是处的教育体系，传承了中华民族辉煌的文明，涵养的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在无数有名或是无名的老师们的精心教育之下，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得到了很好的传承。迄今为止，又有哪个民族曾经有过如此庞大的全民教育体系，传承过如此悠久的辉煌文明？就凭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为中华民族的教育历程感到自豪！

一个正常的社会要想有序运行，人们必须掌握两种技能，一种技能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种技能是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中，过多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往往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在大多数主持教育工作的人们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本源，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末流。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应该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抓住了这个本源，末流的问题是很好解决的。但是，忽略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中国人吃了大亏，当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破门而入的时候，中国人才开始意识到自然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也才开始学会了重视对自然科学的学习与研究。

历史发展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已经有了许多座与国际接轨的一流学校，每年培养出来的学生，其数量应该是世界之冠。但是，人们在评价一个学校的优劣时，其依据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是一所小学有多少学生考上重点中学，还是一所中学有多少学生考上名牌大学？主管教育的人们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吗？显然，教育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技能，还要塑造学生的品格，培养一种技能，三年五载大致上就够了，而塑造一种品格却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工作，“百年树人”就是

指的后者。古代的教育体制不可能恢复了，古代的教育精神却应该加以弘扬。我们当今的社会难道不需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莘莘学子吗？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者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太难了！在《北京教育史》付梓之际，聊作“迂腐”之言为本书序。

王岗

记于 2008 年 8 月

概 述

一、研究意义

北京地区作为中国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

由于北京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其教育发展史不仅是中国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对当今社会也有深刻影响。全面认识北京教育的发展历程，并且在此基础上做出客观的评价，不仅为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提供了必要的依据，同时也是我们当今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很好的借鉴。

古人云：“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¹⁾欲通今者必先知古。历史与现实的区分仅仅是相对的，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属于广义的历史科学。李大钊曾明确指出：“社会与历史二者是同质而异观的，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一切史学研究，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陈编，乃是过去、现在、未来和永世生存的人类生活的全部生命”。⁽²⁾研究教育史就是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

二、研究现状

伴随着源远流长的中国文明演进史，中国教育的发展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列代典籍，诸史志传和各家著作中留下了有关古代教育丰富的历史记载，但是对教育这一世代延续的社会现象作科学的历史研究，则是近代新教育出现之后的事情。近代教育的变革过程和发展要求，催生了中国教育史的研究。

早期关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著述,如王凤糟《中国教育史大纲》(1925年商务版)和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上册(1926年北京师大心理室版)等,都带有初始的、阶段性成果的性质。此后的教育史研究则如雨后春笋。如周谷城《中国教育小史》(1929年上海泰东书局版),黄炎培《中国教育史要》(1930年上海商务版百科小丛书和万有文库本),余家菊《中国教育史要》(1934年上海中华版),高希裴《中国教育史纲》(1935年北平进学社版),陈东原《中国教育史》(1935年上海商务版)等。专题史方面,学制史有周予同《中国学校制度》(1931年上海商务版师范小丛书),徐式圭《中国教育史略》(1931年上海商务版学艺汇刊),蔡芹香《中国学制史》(1933年上海世界书局版世界新教育丛书),姜书阁《中国近代教育制度》(1934年上海商务版师范丛书),薛人仰《中国教育行政制度史略》(1934年上海中华版)等。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奠定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模式,其影响持续至今。

近十余年来,通史类教育史研究又出现了很多成果。如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娄立志、广少奎主编《中国教育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黄仁贤编著《中国教育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俞启定主编《中国教育简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不少省市先后出版了以省市为区域的教育史。如涂文涛主编《四川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年),陈乃林、周新国主编《江苏教育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张彬主编《浙江教育史》(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杜小明主编《青海教育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孔令中主编《贵州教育史》(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王豫生主编《福建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傅九大主编《甘肃教育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刘欣森、孟湘砥主编《湖南教育史》(岳麓书社2002年),宝琪、张凤民主编《天津教育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蔡寿福主编《云南教育史》(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马文华著《新疆教育史稿》(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杨新益等编著《广西教育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徐南号主编《台湾教育史》(台北师苑教育丛书1993年),熊明安等主编《四川教育史稿》(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王日新、蒋笃运主编《河南教育通史》(大象出版社2004年),赵承福主编《山东教育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

具体到北京地区而言,作为在中国历史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古

都北京,至今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教育通史。这显然是个遗憾。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北京教育史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虽然没有专门的教育史,但在一些通史类的教育史研究中对北京地区的教育历史发展也已经有所涉及。尤其是在辽金以后,元、明、清的中央官学中都会涉及地处北京的中央官学教育。以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为例。第三卷《宋辽金元》的第八章在论述辽金教育制度时,就介绍了辽南京太学、金中都国子监等中央官学;第九章《元代教育制度》则重点介绍了元大都国子监、司天监以及相关的教学和管理制度。又如,第四卷《明代》中重点介绍了北京国子监以及京卫武学、四夷馆、钦天监、太医院的教学、管理与考试。第五卷《清代》(上)部分也重点介绍了北京国子监、算学馆以及宗学、觉罗学等内容。第五卷《清代》(下)部分关于近代教育发展中重点论述了京师大学堂等内容。第六卷《民国时期》更是有诸多内容涉及北京。关于北京历代的地方官学、私学、书院、科举考试等内容,在通史类教育史中虽然也有提及,但大多简略不详。

另外一类涉及北京教育史内容的著述是北京通史类研究。例如,吴廷燮等编纂的《北京市志稿》,1938年秋季由当时的市政当局临时设立的“北京市修志处”编纂,1939年秋季大体上完成初稿,计一百九十六卷,存原稿一百五十七卷,其中“文教志”部分就是以志书形式对北京教育的反映。又如,李淑兰《北京史稿》(1994年)第七章《京师文化》中有“教育与科举”。此外,曹子西主编的十卷本《北京通史》(中国书店1994年版)也在相关部分论及北京教育史状况。由于这类通史体裁的限制,在涉及北京教育史内容时,也大多简略,缺乏贯通。总的来说,关于北京教育史的专门研究还是空白。

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 区域范围与历史分期

关于北京教育史研究的区域范围,应当以今天北京行政区划所属的范围为主,同时也要随着不同历史时期行政区域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从历史上看,从商周时期的燕、蓟小封国到秦汉时期的广阳郡,再到北朝、隋唐时期的幽州,其治属范围大致都比今天北京的行政区划范围大,明确区域今天虽已不能确考,但其核心区域大致相当于今天北京地区。辽代南京设析津府下辖6州11县。至金代的中都路大兴府,与辽南京析津府相比大为缩小,只辖有大兴、宛平、阴、安次、永清、

宝坻、香河、昌平、武清、良乡十县。此后元代设大都路下辖 10 州 6 县，明代顺天府 5 州 22 县，清代顺天府 5 州 19 县。其间虽屡有变迁分合，但大致区域已经比较固定，而且都基本包括了今天河北、天津的一些地区。

金代定都北京不仅是北京城市发展转折点，北京从原来的地方区域城市成为了此后中国历代统一王朝的都城，而且也是北京教育文化发展的转折点，此后的北京教育文化发展不仅具有地方教育的特点，同时更重要的是具有着中央官学教育的特色，内容更加丰富。因此，本书将辽金以前北京教育发展作为一个时间段，此后元、明、清单独成章。其中清代跨度近三百余年，更是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变的过渡时期，因此清代又按照传统教育和近代教育开端分为两部分叙述。民国时期教育是近代教育的大发展时期，也是我国现代教育的奠定时期，内容丰富，因此也分为两个部分。综上所述，北京教育史的时段划分基本上以我国历史发展的朝代为次序，但同时兼顾北京教育史发展的特点和内容的轻重。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传统教育史的研究，大致以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为基本范畴结构而成。这一研究特点是在 20 世纪初以后逐渐成形的。以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为例，他认为教育史研究的任务包括“说明历代教育制度及学说变迁的原因”、“比较各时代各地方教育之异同和升降”、“阐发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和“以客观的态度批评历代教育之得失，并标明其特异之点”四个方面。⁽³⁾

本卷的撰写则主要以教育制度为主，略及教育思想。这主要是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方面，北京曾经是金、元、明、清的都城，因此教育制度的建设，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在北京教育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北京教育发展史上有代表性的教育思想家不多见，若仅从每个时代教育思想入手，容易偏离北京教育的区域特色。

为梳理北京历史上的传统教育制度，拟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其一，文教政策，即统治者的文化教育政策。在中国封建时代，每当朝代兴替之后，统治者总是要振兴文教，也就是所谓乱世重武，治世则用文。如清统治者在刚定都北京后，就立即修复明北监为国子监；在战火尚未完全熄灭的顺治中，就宣布：“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⁴⁾表明了兴文教的决心。可以说，历代皇帝都高度重视文教事业，因此中国传统教育在相当程度上受历朝历代统

治者文教政策的影响和制约，而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文教政策也各有特点。如果不了解文教政策，就很难理解其教育制度的设立和推行。

其二，中央官学，即封建王朝直接举办和管辖的、旨在培养各种统治人才的学校系统。一般说，封建国家的中央官学，在先秦时期已经创办，而到了汉朝规模逐渐扩大。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乱，官学时兴时废，及至唐朝，中央官学繁盛，制度完备，南宋以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中央官学逐步衰败，实际上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名存实亡。清朝末年，它就完全被学堂和学校所代替。中央官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同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根据中央官学各自所定的文化程度、教育对象和教学内容的不同，中央官学主要分为最高学府（如历代国子监及国子学、女真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等）、特殊教育（如天文历法、医学、算学及武学等）和贵族教育（如历代统治者在王府中设置的教官，及明朝的宗学，清代的旗学、宗学等）三大类。

其三，地方官学，指中国古代社会历代官府，按照地方行政区划，在地方所办的学校。地方官学的设立，或由国家制定出地方官学制度，或由地方官吏重视教育在其治所设置学校，学校经费皆来源于官府。封建王朝的地方官学及其中央官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官学教育制度。从严格意义来讲，古代地方官学应始于汉代。两汉时期，中央曰学，郡国、县、道、邑曰校，乡曰庠，聚曰序，政府规定，校、学置经师1人。序、庠置孝经师1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经常处于战乱之中，导致官学或兴或废，地方官学较之中央官学更为衰废。隋唐时期，地方官学皆在府州和县设有由长史管辖的“儒学”，辽、金时期，府州设学，各县设县学，皆设博士、助教学官。元代地方官学制度比较完备，在路、府、州、县四级，均有相应学校，又在防区卫所设有卫学。明代是封建社会地方官学兴盛的时代，各府、州、县设立府、州、县学，卫所也设有卫学，乡村设社学，还在各地方行政机构所在地设置都司儒学、宣慰司儒学等，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员，皆设训导。清代地方官学基本沿袭明制，依其地方区划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并于乡间置社学；各地均设专职学官，顺天府设有学政。各学教官，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1人。皆设训导佐之，员额不定。

其四，私学，即非官府办理的学校，与官学相对而言。私学包括私家讲学、家塾，以及地方绅士兴办的义学等。此外还有书院，书院初为私立，后来有部分为政府掌控。在北京地区，私学不如南方那样

发达。

其五，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是隋唐到清代的封建王朝分科考选文武官吏及后备人员的制度，更是检验封建教育质量和成效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

3. 资料来源

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5〕}资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北京教育史属于北京史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其相关资料可谓不少，但在时间分布上很不均匀，大致来说，辽金以前的资料很少，元代资料有所增加，而明代以后的资料则浩如烟海，清代及近代史料更是汗牛充栋。

关于辽金以前北京教育的状况，最主要的史料是相关的正史，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北史》、《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以及《辽史》、《金史》等。此外，《后汉纪》、《两汉会要》、《资治通鉴》、《通典》、《文献通考》等也是不可或缺的资料。历代学人在收集资料方面作出了较大成绩，如《全唐文》、《全辽文》和《金文最》等资料集中保存了一些零星的珍贵资料。而早期的相关地方志中，也保存了一些重要的资料。元代史料除了《元史》外，有《析津志辑佚》、《庙学典礼》、《元朝名臣事略》、《元典章》等，此外还有不少元人文集，收录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可供参考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整理的《全元文》。明代史料除了《明史》、《明实录》以及赵其昌辑《〈明实录〉北京史料》之外，还有明人沈应文修《顺天府志》（六卷）、沈榜的《宛署杂记》以及众多明人文集等。清代史料主要有《清史稿》、《清实录》、允禩等奉饬撰《钦定大清会典》、《清会典事例》、《钦定八旗通志》、《钦定国子监志》、《钦定国子监则例》、《钦定学政全书》、《钦定礼部则例》、《钦定科场条例》等。此外，于敏中等纂《日下旧闻考》，周家楣、缪荃孙等纂《光绪顺天府志》，吴廷燮等《北平市志稿》，张茂节等修《大兴县志》，孙承泽《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畿辅人物考》等也都收录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关于后人辑录的教育专题史料，古代方面有张宪承、陈学恂、张瑞璠、周子英主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以及尹德新、蔡春编《历代笔记教育史料》等。关于近代的教育史料汇编，则有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陈学恂主编《近代教育文选》、朱有瓚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